

中国共产党对美好社会制度的百年探索实践与原创性贡献

□ 李包庚 芦敏敏

内容提要 美好社会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中华民族永恒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提出并擘画了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美好社会制度的构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百年接续奋斗史,就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制度建设为导向,不断探索实现人类美好社会愿景的宏伟史诗。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等制度体系,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制度的成功实践,进一步确证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在理论与实践上坚持与发展了社会主义,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也为全球治理与人类美好未来提供了原创性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 美好社会 社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 原创性贡献

作者李包庚,博士,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芦敏敏,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宁波 315211)

DOI:10.14167/j.zjss.2021.06.003

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内在原生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自觉担负起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两大历史重任,其核心就是为中国人民构建美好社会探索现实路径。在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全中国确定下来并得到充分实践,并创造出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保障,并在推进美好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加显著的治理优势。

一、中国共产党探索美好社会制度的文化渊源和理论依据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乏中国古

人对美好社会的田园牧歌式想象,以及构建美好社会的制度方案。这种凝结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理想社会制度的追求,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核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后,在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构建也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美好社会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美好社会的向往

在数千年的宏大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秀文化,其中内蕴着中国先哲对美好社会的深刻洞见以及不懈探索。《礼记·礼运篇》中记载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

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不仅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社会。而在实现“大同社会”这一社会终极形态前,儒家学者又刻画了“小康”这一理想社会初级阶段的图景。

除占据中国传统社会主流的儒学外,诸子百家又提出了多种美好社会的构想。其中,庄子提出了基于无为而治理念的理想社会模式。在庄子看来,治国应当去礼义,施无为,从而实现天下共治,并由此构建了神农之世、建德之国与至德之世的社会模式。墨家提倡兼爱非攻的治世理念,在《治邦之道》中提出诸多治国安邦之策。“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②,集中体现了“墨家消弭邦国、家族、身份各方面差异,纯以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关切的理想社会图景。”^③还有法家对依法治国的制度构建,老子对小国寡民的国家制度的思考等等。古代中国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与现实观照,是中国共产党深化对美好社会内涵的认识,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布局,开辟建设美好社会的理论进路的思想源泉。

2. 马克思主义对美好社会的理论探索

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但同时资本主义的镣铐“异化”了人的本质以及全部实践活动,造成了“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的凄惨景象^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社会状况充分考察后,严厉批判了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制度根源,强调要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⑥,为无产阶级擘画了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美好社会制度的崇高理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员为实现美好社会进行了不懈探索。近代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构建美好社会的

前提条件,而只有“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⑦,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向往。而在此之前,“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界。”^⑧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建国初期三十年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为全面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面对全球化的历史浪潮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充分总结前人的经验,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划时代的举措,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开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制定社会发展路线蓝图,提出“三步走”战略,迈上探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集中回答了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问题,为全面推进美好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以及实践,不仅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⑩,而且为实现共产主义与“大同世界”的崇高理想提供了现实方案。

二、中国共产党对美好社会制度的百年探索历程

正如“美好生活的理念与实践,一定是基于某种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公共价值集体性认同的结果,是以特定制度共同体的方式对于此种价值的不懈追求和坚定践履。”^⑪中国共产党从初创、壮大到执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并坚持发展和完善科学合理、公正平等、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普遍期望。在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逐步完成社会制度的创制,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⑫

1. 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 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政权, 奠定探索美好社会制度的政治基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与其历史发展走向、民族文化基础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全面胜利之后, 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民国政府所主张的, 不过是继续沦为嵌套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的附庸, “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 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⑬这从根本上站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在经历了百年列强侵略、军阀割据、资本倾轧后, 实现国家和人民的独立解放是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需求。要实现人的最终解放, 首要的是实现政治解放。马克思曾指出, “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 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 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 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 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⑭而“社会主义是在集成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革除了资本主义固有弊端的新社会形态, 在实现人的解放方面具有制度优势。”^⑮寻求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平等的强烈需求, 促使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一真理道路。

建立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新兴政权, 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由于人口规模巨大、疆域国土辽阔、民族文化丰富, 中国社会的矛盾错综复杂, 社会关系盘根错节, 这都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带来巨大的挑战。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 建立一个能够使不同社会群体都能参与到政治权力的过程和运作中来, 而不致使政治权力成为少数强势群体和利益集团牟利工具的政治制度, 必须首先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建立整体利益党。因此, 只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 建立一个现代的人民共和国的基础, 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体, 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现代政治的运作。”^⑯因此, 只有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其他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才能彻底打破以既得利益者为中心的利益格局, 将权力重新回归到人民手中, 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也只

有人民群众掌握了政治权力, 才能为探索美好社会奠定政治基础。

2. 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奠定美好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建设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的根本政治制度, 没有现成的、万能的模板可用。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 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⑰早在 1940 年 1 月,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 在中国国情下“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 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应当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毛泽东的这一制度构想, 在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真正成为现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标志着中华民族终于从千百年的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 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 在推进美好社会建设中形成了强有力的共同意志。长期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三权分立”制度视为圭臬。然而, 只追求政治利益而忽视民意诉求的西方宪政制度, 不仅不能弥合国内的矛盾分歧, 反而以操弄阶级对立、分化党派立场、大搞身份政治来获得大选胜利, 民主大选逐渐沦为党派之争的斗兽场。与之相对的, 中国“谋定而后动”的决策制度能够确保政治议题从人民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出发, 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充分酝酿, 经历法定程序后审慎通过, 并且凝聚全社会广泛共识如期落实。兼具合法性与可行性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正是在决策过程中创造和塑造公众预期, 从而凝聚共识并形成建设美好社会的发展合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坚持全国一盘棋, 调动一切有利因素集中力量推进美好社会建设。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的代表, 由其产生的所有国家机构都天然成为“民意”的主理者。因此, 国家政令才能依靠制度在全社会形成全方位的动员效果, 并且“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 促进现代化建

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⑨在这一制度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

3. 建立并完善基本政治制度, 夯实美好社会的新型制度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架构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协调政党关系、解决民族问题、推进基层直接民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夯实了美好社会的新型制度体系。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通过构建新型政党关系,共同致力于美好社会事业的建设。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首次召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初步确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党合作的“八字”方针。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在“八字”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注入更加丰富的内涵。党的十三大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写入党的报告,为继续坚持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建设人民能够广泛持续参与政治生活的美好社会奠定了制度基础。政协制度作为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丰富民主形式的重要制度设计,不仅突破了西方对抗式党派的政治逻辑,而且在各国政党制度安排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人民政协制度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能够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仅有利于构建通力合作而非竞争对抗、广泛团结爱国统一战线、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相结合的新型政党关系,而且以制度保障了社会长远稳定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同心县建立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初步确立。1952年2月,作为指导民族区域自治的

纲领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出台,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落实。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要将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板块,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基本遵循。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首次以基本法的形式正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大力巩固和加强了各民族大团结。与西方处理民族问题不同的是,“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制,而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⑩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更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中国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954年12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对基层民主保障作出了重要规定,开启了基层群众自治的历史新阶段。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传统行政式城乡治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现实,基层群众自治改革迫在眉睫。名非天造,必从其实。“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⑪为了进一步夯实人民直接参与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⑫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对农村村级、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政策、法规、程序、规范的总和,能够引导基层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制度安排。

在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体系中,多党合作与政

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鲜明地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崇高理念,以有效的制度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切实需求。

4.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夯实美好生活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使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基本的生产活动。然而,完全公有制的生产模式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并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进行经济制度改革探索,以在农业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逐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面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在完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物质基础积累之前,应当辩证看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中的作用。“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命题,创造性地厘清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强调二者都只不过是配置经济资源的手段,不是区分意识形态的标准。这就突破了以往所有西方经济学家们的错误判断,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保障了经济发展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充分释放了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潜力,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一方面,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

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经济能够保障中国道路不偏向、不偏离,在社会救助、民生保障、公共资源配置等美好社会建设方面发挥基石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所有制关系归根究底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依靠各种所有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因此,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④党的十八大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针,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正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犹如中国经济的两翼,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发展,还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公平正义方面的极大优越性。在“分蛋糕”问题上,早期的“共产风”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遇到的瓶颈不仅仅是物质基础的缺乏,生产要素的禀赋与积累不足,同时缺乏一种能够进行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以及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进行的能把人们的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有效制度安排。”^⑤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纠正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后,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即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推动经济与收入同步增长、收入差距与贫困人数同步缩小方面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再分配过程中确立的“最少受惠者”受惠的分配原则,保障了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资源倾斜,以及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促进了欠发达地区补

齐发展短板,充分体现了公平正义这一重要价值。

5.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构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冷战阴云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围追堵截,中苏关系发展的不稳定性,如何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关键一环。中国共产党顺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和平平等国际交往的愿景,提出了从“一边倒”到“一条线”的战略突围,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填补了中国外交的理论空白,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开拓奠定核心基础,更为广大亚非拉国家发展国际友好关系先行垂范。

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推动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坚决驳斥西方“国强必霸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等霸权外交理念,坚定奉行和平发展、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外交准则。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对外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上,逐步从“互利”到强调“惠及”,由保持与周边密切经济合作提升为建设“命运共同体”,在践行“亲、诚、惠、容”外交理念上更加奋发有为,更加勇于担当。2012年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为推动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合作倡议奠定理论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通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铁路、公路、航空、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突破,国际金融合作水平日益提高,在推动沿线国家共享市场红利上稳步发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构建世界普遍交往新范式提供价值准则与方向引领。”^②当前,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只维护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或者说是一些垄断行业和部门的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全球亟待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平等交往、合作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世界各国互联互通,命运休戚与共。建设符合美好社会愿景的国家政治经济新制度,必须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局限,从解放全人类的高度出发。从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到取得全球减贫史取得伟大成就,从积极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到提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一揽子中

国方案,从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入践行,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为世界贡献大国力量,也在以自身的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世界,为世界建设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提供更多可能。

三、中国共产党探索美好社会制度的原创性贡献

实践是检验制度优劣的最终标准。好的制度能够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真正行得通、真管用、有实效。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美好社会制度方面,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

1. 开创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确证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马克思晚年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曾思考过东方社会能否在物质生产落后的情形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对当时俄国具体现实进行客观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对东方社会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推动俄国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虽然苏联最终走向了体制僵化、亡党亡国的结局,但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作出的历史功绩,是难以泯灭的。1992年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终结论”等鼓吹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的言论甚嚣尘上。

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③苏联的失败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中国的成功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的极大优越性。中国制度的成功实践不仅证明了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更为如何实现跨越提供了中国经验。历史与实践证明,中国以跨越社会

“制度”而非“经济的社会形态”来缩小发展差距,以灵活处理社会变革和国际交往中的矛盾关系来协调改革与开放,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实践。一方面,“无论是出于发展中国现代化,还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需要都必须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②只有充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乃至人类文明的一切进步成果,努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为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如何吸引资本而非资本主义,如何利用资本而非被资本主义变革,需要每个国家在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和运用集体智慧,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因为,“在无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③

当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各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在社会动员、整合、协调、发展方面展现出强大力量,直接强有力地证明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确证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达到更加成熟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加完善的时候,必将更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和蓬勃生命力,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障。

2.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赢来了光明前景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在中国改革、发展、建设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又一次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崭新的国家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的制度样板。在这一层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

首先,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力量。从历史发展纵向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注重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紧密

结合动态的时代条件、发展目标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人类社会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七十年来在经济、政治、科技、国防、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生态、安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制度性成就。从横向比较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困境,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发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最终命运的科学判断。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发展的超越,是历史的超越,更是文明的超越,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永不过时的真理力量。

其次,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破除了社会主义教条式发展的迷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致使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坚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时间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④在实践与理论的协调发展中,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更在实践上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功后的建设难题提供了中国的制度方案。

最后,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赢来了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经验,成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不断取得历史新突破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实践创新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为世界社会主义在理论层面不断开辟新境界,在实践层面不断开辟新路径,提供了科学思想的磅礴伟力。

3. 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极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著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在摸索与革命中,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直接为中华民族探索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奠定了政治基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地方到中央的部署落实,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区域民族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国家政治实践中的逐步确立,众多涉及国计民生方方面面的重要制度从无到有的不断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夯实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治理探索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从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的伟大飞跃,真正实现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在守正与改革中,中华民族以全新的面貌昂首于世界民族之林。党在领导人民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原理和方法论,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又注重各方面协调发展;既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注重发展多种形式的民主;既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共赢,又强调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坚持和巩固经过实践检验的制度体系,又强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既坚持多种要素分配激发生产动力,又强调分配的普惠性、公益性与平等性。在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走向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兼具治理优势和治理效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中国大踏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伟大梦想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创新与完善中,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生重要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华民族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向着更加完善、更加健全、更加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②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走在建设美好社会的康庄大道上,中华民族正在迎来伟大复兴的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4. 为全球治理与人类美好未来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入到现代化社会,拥有先发优势的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就通过构建殖民体系框架,以窃取盘剥他国利益的手段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交往体系。在国际交往日益普遍紧密的当下,“世界普遍交往彻底改变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与交往原则,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③,然而资本的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的无序化,“世界仍是由在无政府状态下生活的国家所组成。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其他国际组织,都没有针对大国的强制手段”^④,而发达国家却能够继续通过金融操纵、贸易壁垒、意识形态操弄等方式不断转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维持本国在生存发展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背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一国扩展到全球,演变为生产力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⑤。为了掩盖资本在全球肆虐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灾难,西方不少学者提出了“全球化悖论”。即不受政治地理划分的资本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不能给囿于地缘因素限制的各国劳动人民带来实际收益,从而导致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因此,解决“全球化悖论”的办法只能是三者择其二,这也为当前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等强盗做法提供了滋生土壤。

曾经从全球化中攫取世界利益的少数发达国家,躺在先发优势上却大搞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其根本目的在于遏制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发展权益。资本主义国家所提出的全球化、民主制度与民

族国家不能共存的“三元困境”,无异于掩盖资本主义困境的遮羞布。全球化的目的应当是实现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普遍愿景,而非成为阶级压迫的剥削工具。而建设美好社会首要的是构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全球治理新制度。“合规律性”在于,美好社会制度的构建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走向。“合目的性”在于美好社会制度的构建有赖于对社会“公意”的根本回应。因此,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内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更是全球人民对于美好社会的普遍向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制度、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突破“全球化悖论”提供了新的理论与实践路径,破除了西方构建的绝对秩序和话语体系的垄断,打破了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为全球治理和人类美好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

结 语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多样的文明型国家,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从近代内忧外患的残酷斗争中,从新中国七十年的雄伟史诗中,开辟了一条植根中华大地、立足社会现实、独具中国风采的发展道路,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中国魅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建设美好社会上取得的非凡成就,不仅以事实鲜明展现中国制度在治党治国上的治理效用,而且为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制度方案,有力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制度文明建设。

注释:

①金晓东校点:《礼记·礼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②施明译注:《墨子》,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③马腾:《论清华简〈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51、199页。

⑦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71、1469页。

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⑩⑪⑫⑬李包庚:《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⑭袁祖社:《公共价值的信念与美好生活的理想——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深蕴》,《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⑱李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历史逻辑与当代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2页。

⑲王绍光:《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12页。

⑳㉑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㉒《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㉔叶小文等:《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光明日报》2014年9月23日。

㉕㉖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7年第21期。

㉗《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㉙夏锦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研究丛书·制度自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页。

㉚《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㉛胡博成等:《从帝国主义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两大社会制度关系认识的转换及动力机制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㉜《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

㉝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4、354页。

㉟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页。

责任编辑 戴道昆

ABSTRACTS

The Practical Way and Trend Prospect of the Centennial Process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4)

Liu Tongfa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has shaped the centennial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constituted the basic rational path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f China promoted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highlighted the ideological leading significance of Marx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whose mission is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has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opened the journe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ith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long with this journey, the CPC has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task and the realistic goal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ed on their own practice, in the global field of vision, ta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s the external driving force of Marxism, grasping dialectically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nd practice effect, expands the problem domain and theory of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romoted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unique in its inherent and overall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practice. Facing the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 we should define the development theme of the new era with a high degree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cre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and contribute wisdom to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forms of world civilization.

Key words: Marxism; sinicization; centennial process; practical way; prospect

Several Basic Issues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Pondering based on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4)

Chen Peiyo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Choosing Marxism is a historical choice in China, not the choice of a specific historical time point, but the choice of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It is a destined choice from a dependent country dominated by capital logic to a country actively pursu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accidental subject choice of advanced intellectuals presents the inevitability of history in the subsequent historical stag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cannot be proposed through pure textual research or theoretical logical deduction. It is essentially opposed to dogmatism, which has a dogmatic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and empiricism, which attaches too much importance to experience and fails to see the value of ideas and theories. It contains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of treating Marxism scientifically.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s the unity of Marxism and China, the unity of process and result, and the unity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poch will open up new realms of thoughts and entrust originality to thoughts. Marxism must continue to open up new realms, to make original contributions in order to guide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main thread that should be grasped in the research and propaganda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s: appreciating the wisdom of Chinese Communists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cademic purport which should be adhered to is: facing China’s real dilemmas, making academic responses,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ideas, and boosting the progress of practice.

Key words: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Marx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entenary Exploration, Practice and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Beautiful Social System (22)

Li Baogeng, Lu Minmin

(College of Marxism Studi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Abstract: A better social system has been the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ver the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past thousand years. The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s pointed out the lofty ideal of realizing communism, a beautiful social system of human beings. The history of the continuous strugg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ince its founding is a grand epic of exploration and realization for mankind's vision of a beautiful society through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 have established, developed and improved fundamental and important systems in the course of long-term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thus forming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system has further confirmed the possibility of crossing the "Kafudine Gorg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soci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ushered in a bright prospect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vided original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a better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a better society; social syste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riginal contribution

Research on the Way of Industrial Policy Curb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hifting from Real to Virtual" (31)

Han Chao, Yan Mingzhe

(Center for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Abstract: Maintaining a stable propor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while the signs of "shifting from real to virtual"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eed to be curbed in time. There is still no clear answer to restra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shifting from real to virtual", especially how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an guid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o concentrate on their main business. Relying on th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ssible inhibitory effects and their influence paths of the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identified in the Five-Year Plan financi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key industrial policy h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financialization trend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und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restraining effects of the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o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re more significant for non-state-owned companies, high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companies and lower government financial resources compani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key industrial policies inhibit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rough loan support and tax relief, we further infer that the main motivation fo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comes from preventive savings.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restrain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with industrial policy guidance.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ies; manufacturing company;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shifting from real to virtual

The Impacts of Industrial Robots 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40)

Zhou Minghai¹, Zheng Tianxiang², Wang Qiushi³

(1.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Ningbo 315100;

2.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WC2A 2AE;

3. China Academ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s: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o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industrial robots 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We find that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significantly lowers the distributional shares of labor factor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China. By decomposing components of labor's share of income,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industrial robot 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technology on the changes of labor's share of income are mainly through employment substitution effects and mildly through wage promotion effects, but not through the effects of efficiency gains. Both direct impacts and channel analyses support the short-run success of the "replacement of workers with robots" incentive policy.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is biased towards capital and imposes negative impacts on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through wage channel remain to be verified in the long run.

Key words: industrial robots;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labor's share of income; replacement of workers with robots; policy evaluation

Reconceptualizing the Autonomy of Law (51)

Yu Xingzhong

(Anthony W. and Lulu C. Wang Professor in Chinese Law,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Abstract: The autonomy of law is a significant issue in legal studies and an essential theoretical pillar upon which the modern legal system is built. Traditional legal theories have discussed the autonomy of law to varying degrees. However, critical jurisprudence and postmodern jurisprudence have been skeptical of the